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人物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合作建立了中国在海外的首个鲁班工坊, 泰国教师黄可莹和中国教师孙健鹏因此结缘——

“尽我俩最大努力 加深中泰友谊”

见习记者 董嘉程

沿着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思源湖边的小路走到头, 左手边是一座颇有工程实践创新项目体验中心的场馆, 这就是学校泰国鲁班工坊所在地。推开大门, 正对着的是一尊鲁班雕像, 神情庄重地凝视远方, 来自泰国的教师黄可莹常常在这儿驻足良久。2016年,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泰国大城技术

学院合作建立了泰国鲁班工坊, 这是中国在海外的首个鲁班工坊。7年来, 从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走出上百名泰国长期留学生和上千名短期交换生, 他们中许多人回到自己的国家, 成长为所在行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背后, 是中泰双方教师和工作人员默默奉献的身影。黄可莹和她的爱人孙健鹏, 就是其中两位。

黄可莹和孙健鹏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会场。学校供图

1 “我喜欢中国的氛围”

黄可莹出生于泰国暖武里府。年纪尚小时, 偶尔听邻居谈起, 在中国学习、生活很辛苦, 这便构成了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高中的时候, 听说中国发展得很快, 泰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慢慢改变了。读大学的时候, 黄可莹选择了中文专业。以前学中文专业的人比较少, 大部分学东方语言的人会上日语, 但到了我们那一届, 学中文的人数差不多是学日语的3倍。

本科毕业后, 黄可莹在泰国工作了几年。她一直想来中国继续读书学习, 亲眼看看现在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2013年, 她如愿以偿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来到天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中国发展得很好, 和我小时候听说的一点儿都不一

样。她说, 10年前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就有网购了, 什么都能买到。这几年有了移动支付, 生活更方便了。

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 黄可莹选择留在天津找工作。一天, 她接到天津大学的老师发来的消息, 有一个项目需要会中泰双语的翻译, 便欣然应允。这个项目正是当年成立的泰国鲁班工坊。谈及此事, 黄可莹的同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主任黎志东说: 她靓丽的外表、温柔的性格, 当然还有出色的翻译,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 黄可莹留在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任职, 负责泰国鲁班工坊的日常管理和中泰双方的沟通联络, 同时为泰国来华留学生教授中文。7年间, 黄可莹

参与制定了中泰合作国际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国际教学标准, 该方案获得了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并在泰国得到了推广。此外, 由于中泰职业学校合作育人的实践与探索, 这一教学成果, 她与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的同事们一起, 荣获2018年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今年是黄可莹来到中国的第十年, 除了仍不习惯天津寒冷的冬天, 她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的生活。我喜欢中文, 喜欢中国的氛围。她说, 我现在做的工作很有价值, 可以促进中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可以帮助泰国学生获得来中国学习的机会, 间接促进中泰两国的共同发展。

2 “中泰两国青年交流交往的最好见证”

2017年, 在泰国鲁班工坊的一次会议上, 黄可莹邂逅了她现在的伴侣——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孙健鹏。黄可莹负责泰国鲁班工坊的国际交流工作, 孙健鹏负责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用孙健鹏的话来说就是, 我俩的工作交流特别多, 自然而然从相识到相知, 然后到相爱。

接触时间长了, 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她办事认真, 工作细

致, 特别善良, 对父母也孝顺。他包容性很强, 心地善良, 很有爱心, 跟他在一起感觉很舒服。2022年, 黄可莹和孙健鹏在天津登记结婚。经历了5年的爱情长跑之后, 两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天津生活多年, 黄可莹品尝过各种各样的中国美食, 但最喜欢吃的还是孙健鹏亲手做的红烧肉。为了做好这一手红烧肉, 孙健鹏可没少下功夫, 一边跟着视频学, 一边自己慢慢摸索, 总算做出了黄可

莹喜欢的味道。有点儿咸, 还有一丢丢甜, 我觉得不腻。黄可莹说。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传到了其他教师耳中。在最初的惊讶之后, 同事们纷纷送上祝福。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总说我们俩是中泰两国青年交流交往的最好见证。孙健鹏笑道。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包守超说: 在泰国鲁班工坊建设过程中, 他们两人从友情升华为爱情, 也是天津职业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3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做到问心无愧”

在泰国, 泼水节是新一年的开始, 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人们相互泼水庆祝, 寓意着祛除疾病和灾难, 祝愿吉祥与幸福。学校为泰国来华留学生和教师举办了泼水节, 孙健鹏忙里忙外, 帮着布置活动场地和各种道具, 还亲自动手给泰国学生们扎花篮和花环。当然, 他也收到了最多的祝福。大家一起玩水的时候, 泰国学生和老师们把我推到水池里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孙健鹏忍不住笑了起来。

自泰国鲁班工坊成立起, 孙健鹏就开

始负责留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教学, 同时也担任他们的班主任。他工作认真、态度温和, 深受留学生喜爱。在留学生眼中, 孙健鹏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哥哥, 小到借钱买东西, 大到专升本的手续办理,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总是先想到孙老师。

第一届泰国来华留学生毕业时, 孙健鹏作为班主任上台发言, 中途不禁落泪。留学生们同样依依不舍, 整个下午都拽着他, 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合影留念。时至今日, 尽管分隔两国, 师生之间依旧保持着

联系。元旦和春节的时候, 他们会打个视频问候一下, 发个祝福, 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我说得等到有空的时候。孙健鹏说。

今年暑期, 孙健鹏没有休息, 而是留校指导学生备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这一忙, 可能要年后才能去泰国了, 不过孙健鹏依然乐在其中: 为了中国的职业教育, 为了把泰国鲁班工坊做好, 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做到问心无愧。

4 “希望起到国际交流纽带的作用”

2022年, 在学校教师节庆祝大会上, 黄可莹被选为教师代表发言。她说, 自己只是泰国鲁班工坊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但很骄傲能够为中泰友好交往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 黄可莹站在泰国鲁班工坊门口, 面带微笑眺望着远方, 几千里外的泰国, 有她的家乡暖武里府, 还有泰国鲁班工坊所在的大城府。我会好好地工作, 发挥我的作用。希望能通过我, 让中国更爱泰国一些, 让泰国更爱中国一些。

因泰国鲁班工坊与中国结缘的不止黄可莹一人。自2016年以来, 先后有上百名长期留学生和上千名短期交换生前来学习, 其中许多人回国后选择了当地的合资企业。他们既会中文, 又懂得中国的先进技术, 因此很好找工作, 薪酬也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一些学生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知识技能, 更因为这段留学经历改变了人生。艾

美丽是泰国鲁班工坊第二届学生, 来到中国后, 她利用课余时间做些小生意, 赚取机票钱和生活费用。她毕业后回到泰国, 先是在一家中资企业工作, 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公司, 帮家里还清债务,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经过了7年的实践, 如今的泰国鲁班工坊无论是教学还是设备, 相较于成立之初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孙健鹏说, 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国师生也会前往泰国进行短期学习和交流, 了解对方的教育模式和教学理念。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 继泰国鲁班工坊后, 中国又陆续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展开合作, 相继建立了多个鲁班工坊。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 不仅学习到知识技能, 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 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这背后, 是许许多多

多像黄可莹和孙健鹏这样的教师, 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默默奉献。希望尽我俩最大的努力, 起到国际交流纽带的作用。黄可莹语气坚定地说。

国际观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纵观世界多个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 无不表现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紧密关联, 直至深度融合、一体化推进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初期, 韩国经济起飞取得的初步成果开始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之后30余年直至21世纪前后, 韩国经济基本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在韩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 依靠教育培养大量适应新经济需求的人才, 通过新型研究型大学和创新高地的协同建设推动尖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为产业发展夯实基础, 通过积极振兴和投资英才教育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后备军, 为国家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教育顺应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规格变化需求

1962年, 韩国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的自立化与工业化。因此, 20世纪60年代初, 韩国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自助、自立、自主。到20世纪70年代末, 韩国经济实现了年均8.3%的高增长。在此期间, 韩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 一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力集约型产业结构, 二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资本集约型产业结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韩国广泛开展扫盲运动, 并快速普及小学教育, 为韩国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大量合格的劳动力, 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成效显著。进入20世纪70年代, 受能源危机和国际经济低迷等因素影响, 过分依赖外资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副作用, 低附加值的劳动力集约型轻工业产品也逐渐丧失竞争力。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已无法满足国家发展需要。韩国政府将构建自立型经济结构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新目标, 决定通过发展重化工业加速工业化进程。

1973年1月, 韩国发布《重工业化宣言》, 突出强调重化工业立国的发展战略。该时期韩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迎合了重化工业技术发展与人才培养需要。在中等教育领域, 韩国政府持续增设职业类高中, 着力发展各类工业高中, 20世纪70年代职业类高中增设了124所, 学生数以年均10.5%的比例增加。在高等教育领域, 韩国政府重点支持工学专业发展。以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特色化政策为例, 在1973年首批获批建设的18所大学51个特色化专业中, 工学专业有25个重点资助机械、材料、造船、化学、电气和金属等专业, 同时大幅增加相关专业招生人数。以釜山大学工学院机械专业为例, 1976年被选定为特色学院时该专业招生人数为90名, 1980年招生人数增加至1000名。

进入20世纪80年代, 韩国政府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经济发展方针, 采取稳妥的自由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发展。同时, 改变重化工业主导型经济政策, 制定以高科技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决定劳动力市场人才层次需要, 教育结构也必然会发生改变。韩国职业教育也由高中阶段向高等教育阶段延伸, 开始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 将各地实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专科学校, 扩大专科学校招生名额, 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专科学校质量。截至1990年, 韩国专科学校学生数量从1980年的16.5万人增加到32.3万人。至此, 韩国形成了由职业高中、2+3年制专科学校、4+1年制制职业学院组成的职业教育新体系, 实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促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挑战, 韩国出台新型职业教育培训体制方案, 旨在建立面向终身学习社会的终身职业教育体制,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扩大职业高中的培养能力。同时, 在普通高中开展职业教育, 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根据1962—1996年数据统计, 韩国普通高中和职业类高中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4左右。1962年, 普通高中在读学生数19.4万名, 职业类高中在读学生数12.4万名; 1980年上述两组数据分别是93.2万名和76.4万名; 1996年分别是130.3万名和93.9万名。

随着韩国适龄人口迅速下降以及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 职业高中毕业生也从之前的以就业为主转变为以升学为主, 究其原因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职高毕业生选择继续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深造, 以期得到更好的工作。

总体而言, 20世纪下半叶韩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尤其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韩国经济腾飞对各种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本储备。

协同共建新型研究型大学、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一流大学建设是教育强国的核心竞争优势。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有赖于一流大学基础研究的强化和原始创新的加强。

20世纪70年代末, 韩国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科技立国的前提是增强国家尖端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 振兴基础领域研究, 快速提升以大学为中心的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韩国借鉴美国经验, 意识到新型研究型

韩国形成人才与产业发展共生机制

大学在组织架构、跨学科融合、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在原有传统研究型大学基础上, 陆续兴建了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和科技园、区域性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大学科技园, 推动人才的引育并举, 从实践层面推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协同共建。

韩国新型研究型大学中, 韩国科学技术院和浦项科技大学最具代表性。二者有相同的发展特征, 即与代表性国家创新高地共生共荣。其中, 韩国科学技术院走的是政府主导型建设路径, 而浦项科技大学则是企业(市场)导向型建设路径的典范。

韩国科学技术院始建于1971年, 是韩国第一所研究型科学与工程院, 建设初期通过吸引海外韩国籍科学家和集聚国内相关专业领域人才奠定发展基础, 逐渐从培养解读国外先进技术工程师向培养科技创新型领导者。1989年, 韩国科学技术院与始建于1973年的韩国大德科技园整合发展, 韩国科学技术院主导基础研究, 大德科技园内的大型公共科研机构及高技术企业聚焦应用技术开发。大德科技园最早主要从事机械、能源、化学、造船等重化工领域的研究开发, 20世纪80年代逐渐向电子、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新材料以及航天卫星、生物工程等领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 韩国国家原子能研究所、电子通信研究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三星等企业研究所, 成为韩国最大规模人才中心和科学技术聚集地。

浦项科技大学创建于1986年, 依托浦项制铁和浦项国家工业园迅速成长, 旨在为韩国培养尖端的理工科技人才。据2022年韩国《中央日报》大学评价, 浦项科技大学在韩国工科类专业排名第一, 自然科学类排名第二。可以说, 浦项科技大学与韩国科学技术院一道, 引领了韩国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

为满足国家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韩国除人才自主培养外, 还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一方面, 韩国科技部1968年着手启动“海外科学家引进计划”, 以全职和兼职形式, 引进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科技工作者赴韩工作。1968年至1990年, 通过该计划引进1051名全职研究员, 1968年至1994年, 引进1127名兼职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 韩国将人才建设工作重心转向培养研究人员及引进海外高端国际人才, 分别实施了“高级科学工作者招聘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和“留学韩国”等项目。另一方面, 韩国科技部从1981年开始启动“国内科研人才海外研修计划”, 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提供在国际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研修的机会。1982年至1990年, 共有1144人获得该计划的资助。直至20世纪末, 该计划的实施规模均稳定在每年200人左右。高端人才成为支撑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科研机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协同共建的关键性资源, 是韩国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推进英才教育以培养主导国家改革发展的创造性人才

为应对变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需要培养能够解决多样性问题的、具备自我主导能力和变革能力的人才。如何实现人才的早发现、早培养、早成才, 是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暴露出韩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 国内要求从教育改革中寻找对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确保国家竞争力, 韩国开始发掘和培养在特定领域具有特殊卓越才能的人才。1983年, 韩国设立第一所英才中等教育机构——京畿科学高中, 1984年在大田、光州、庆南等全国各主要市、道陆续开办了科学高中。截至1993年, 全国12个市、道共设立13所科学高中, 与普通高中不同, 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大大增强了科学性, 并且实施加速课程。1983年至1992年, 科学高中共有3000多名学生被韩国科学技术院录取, 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进入大学。

20世纪末, 由于国际尖端科学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性问题增加、全球供应链危机等国际环境的持续挑战, 加之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数字化转型、地区均衡发展等社会问题的需求日益迫切, 韩国开始着力提高英才教育的系统性与效率性, 并且为更多的儿童提供接受英才教育的机会。1996年, 韩国教育开发院设立全国英才教育中心, 各市、道教育厅开设英才教育院, 1997年科技部指定部分大学下设科学英才教育中心, 通过放学后及周末、寒暑假项目开展与中小学各阶段正规课程相衔接的多样化主题学习和深度学习。

21世纪初, 随着《英才教育振兴法》的制定与实施, 韩国正式构建了基于英才学校、英才教育院、英才班级的英才发掘与培养体系。从2002年开始, 韩国每五年颁布一次《英才教育振兴综合计划》, 在第一次综合计划期间, 英才教育受惠学生数从2003年的1.9万名增长至2007年的4.6万名, 教育机构数量从2003年的400所增加至2007年的663所。此后, 英才教育受惠学生数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 为12.1万名。随着英才教育体系不断成熟, 《英才教育振兴综合计划》设定的英才教育发展重点逐渐从关注质量提升, 转向机会扩大, 最终走向全面培养主导国家改革发展的创造性人才, 为韩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彼此支撑、相互促进, 推动了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国家迅速崛起。(作者单位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建设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22JJD880006]成果)



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泰国鲁班工坊

见习记者 董嘉程 摄